



袁世凱与

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

李德福 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

李德福 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李德福著. — 五家渠: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7-80756-065-4

I. 袁… II. 李… III. ①袁世凯(1859~1916) - 人物
研究②政治制度 - 历史 研究 - 中国 - 近代 IV. K827-52
D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7287 号

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

出版发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地 址	新疆五家渠市迎宾路 619 号
邮 编	831300
电 话	0994—5825298 5825226 5825228
传 真	0994—5822600
印 刷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7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6-065-4
定 价	18.00 元

前 言

在清末民初历史的研究中,关于袁世凯的研究无疑是一个重要课题,是解析该时期中国政治发展进程的重要枢纽之一。但是,与学术界研究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颇为丰硕的成果相比,对袁世凯及其他一些重要的所谓反面人物之系统研究,始终是个薄弱的环节。这种薄弱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专著和文章不多,二是评价有欠公允和全面。

自古以来的我国史家,对人物的评价一直有所谓“忠奸之辨”。受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方法影响和几十年来习惯的思想认识束缚,许多论者在历史人物研究中,尤其是在对近现代史人物的评价上,总是惯于以正面或反面人物来划分,认为一个人的行为作用和政治面貌非此即彼,因而使认识问题的角度受到框框的局限,对一些本来不难弄清楚的问题长期得不出切近事理的回答。其实,对这种非此即彼的认识方法,恩格斯早已批评过:“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马恩全集》第20卷,第554页)。革命导师所阐明的这种辩证的认识论,是我们进行学术研究工作时的指南。事实上,仅就对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总体观察来看,他们的一生也往往确实表现出多重色彩,远不是能够用简单地黑白论便可以去概括和定性的。

袁世凯是清末民初北洋军事政治集团的创始人和最高首领,其实力地位真正为人瞩目是在19世纪的90年代中期以后,此时

的大清帝国已可谓“败絮塞漏舟，腐木支大厦”，摇摇欲坠。历史唯物主义从不低估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因为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是能够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推动或延缓历史发展的进程的。面对当时资产阶级稳健派力量先后开展的维新和立宪运动，我认为：袁世凯基本上追随、参与乃至跟上了时代潮流，称得上是他们的同路人；在革命派发动的辛亥革命中，袁也没有迷信手中的武力全力去阻挡，并在倾覆清王朝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他在这其间的活动，虽然夹杂着个人和本集团利益的考虑，但也终究顺应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讲，袁世凯在清末的基本表现和作用是应当被肯定的。他在民初柄政期间，主观上无疑有追求独裁专制的一面，甚至最终演出了一幕恢复帝制的闹剧，对此无可原宥的历史罪责不应当去刻意美化，但我们在予以痛责的同时，还要研究和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主客观环境，尤其不能忽视其独裁专制的主观追求与当时实际的政治状况、实际的政治运行之间仍存在着相当距离的考察；不能忽视袁世凯政权对民国初年经济社会恢复和发展起到的一定推动性作用。

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课题。由于笔者学识水平有限，虽经过努力钻研思考，但自己深感对本课题的研究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提高，敬祈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前言

内容提要	(1)
------	-----

第一章 晚清的袁世凯及其北洋新军	(8)
------------------	-----

第一节 清末袁世凯主要政治活动之考察	(9)
--------------------	-----

1. 在清末政治近代化运动中的表现	(9)
-------------------	-----

2. 在外交和发展社会经济方面的基本表现	(15)
----------------------	------

第二节 北洋新军的建立	(28)
-------------	------

1. 北洋新军创建的历史背景	(28)
----------------	------

2. 北洋六镇的形成	(34)
------------	------

第三节 对清末北洋新军性质的分析	(39)
------------------	------

1. 北洋新军的建立与发展直接得益于戊戌维新和	
-------------------------	--

清末新政运动	(41)
--------	------

2. 从军制特点看北洋新军之属性	(45)
------------------	------

第二章 袁世凯集团与清王朝的覆亡	(57)
------------------	------

第一节 袁世凯集团与清廷的矛盾	(57)
-----------------	------

1. 辛亥革命前两者矛盾之综述	(58)
-----------------	------

2. 双方矛盾和斗争性质的分析	(63)
-----------------	------

第二节 袁世凯集团在推翻清王朝过程中的作用	(68)
-----------------------	------

1. 辛亥革命前各种政治力量的实际状况	(69)
---------------------	------

2. 历史抉择中的袁世凯集团	(75)
----------------	------

3. 袁世凯集团历史功绩的评价	(81)
-----------------	------

第三章 民初袁世凯实行独裁统治的客观必然性	(91)
第一节 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超前构想与民初的政治保守主义	(92)
1. 对近代中国民主政治超前构想的历史回顾	(93)
2. 民初政治保守主义的兴起和泛滥	(99)
第二节 民初政党的畸形和代议制度的脆弱	(106)
1. 民初政党之丛生及其畸形表现	(106)
2. 代议制基础和它本身的脆弱性	(116)
第三节 民初各界对安定社会秩序的渴望	(126)
1. 辛亥革命后社会秩序之混乱	(126)
2. 民初各界对秩序的渴望及其表现	(130)
第四章 关于袁世凯政权的一般评价	(139)
第一节 政权结构仍具有资产阶级政体形式及其相关内容	(140)
1. 保留了资产阶级政体的基本形式	(140)
2. 资产阶级在政治生活中仍有相当之地位和作用	(145)
第二节 经济政策与民初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149)
1. 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思想认同	(149)
2. 各项经济政策和法规的出台	(153)
3. 经济政策和法规的实施情况	(160)
第三节 袁世凯统治对中国社会的主要负面作用	(169)
1. 袁世凯政治风格的消极影响	(169)
2. 揭开了军人干政的帷幕	(174)
3. 奠定了军阀派系形成和纷争的基础	(178)
主要参考书目	(186)
后记	(190)

内 容 提 要

第一章探讨和分析晚清的袁世凯及其北洋新军。

本章第一节首先结合清末政治近代化的两大运动——维新和立宪运动,对袁世凯的基本政治态度和倾向进行了考察,认为他能够追随、卷入乃至跟上了时代潮流,称得上资产阶级稳健派力量的同路人。这期间及其后来他的许多活动,虽然均夹杂着个人和本集团利益的考虑,但也终究顺应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应当得到人们给予积极性评价的。其次,考察了袁世凯在清末外交与发展社会经济这两方面的表现,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总的政治经济格局下,他在一定范围和幅度内,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能够有所维护,对其主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起到过促进作用的。本章第二节重点考察了袁世凯创建北洋新军的历史背景,在肯定任何一个政权建立和需要军队的根本目的,都是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秩序的一般前提下,认为在甲午战争前后大约 20 年没有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国内阶级矛盾相对缓和,而由大规模对外战争刺激和威胁下建立的北洋新军,其创建的直接目的主要还是为求自强以抵外侮。并且,它在当时的某些防御外活动中,也发挥过直接的或潜在威慑的军事作用。本章第三节以形式与内容、本质与现象的辩证统一观点,对清末北洋新军的性质进行了分析。认为由于这支军队的建立和发展直接得益于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运动,所以,对它性质的判断要与这两个运动性质的判断相联系、有些地方要相一致,因而可以说它是当时整个社会及其庞大上层建筑开始“部分质变”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章评述了袁世凯集团与清王朝覆灭之间的关系。

本章第一节首先对袁世凯集团与清廷亲贵集团的矛盾和冲突,作了扼要的回顾和分析,认为它们之间斗争的性质是不能仅以“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倾轧”来简单定性的,而具有形成中的官僚资产阶级与封建顽固势力斗争的性质,同时还带有浓烈的满、汉民族矛盾之色彩。第二节评价了袁世凯集团在倾覆清王朝过程中的作用。书中先是介绍了辛亥革命前各种政治力量的实际状况,即: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以及城乡群众的自发斗争,都还不足以构成置清廷于死地的强大力量。接着考察和分析了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历史抉择中的基本政治倾向,认为他在当时民主共和的历史潮流下,没有迷信手中控制的武力去倾全力阻挡革命,也没有像黎元洪那样被枪逼着才转变态度,这其中既有他对清廷亲贵集团由来已久的愤懑情绪和个人利害得失的考虑,也有他对历史必然趋势的感悟,及其对各派资产阶级呼声的同情和响应。最后,书中引用了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各派资产阶级领袖人物当时对袁功绩的承认和推崇之词,进一步肯定了袁世凯集团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功绩。这是因为辛亥革命最直接的目标和最大的成果是推翻了清朝皇帝,政体变革是这次革命的显著特点之一,而恰恰在这方面袁世凯及其集团发挥了某种非常关键性的作用。同时,书中还反驳了所谓“大奸大盗”之类的不恰当认识,而对袁世凯在倾覆清廷过程中进行的各种权谋策略性活动,给予了一定正面和积极性的评价。

第三章分析民初袁世凯实行独裁统治的客观必然性。

本章第一节首先对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的超前构想进行了历史回顾。民主政治从来不是中国的土特产,它是随着西方国家炮舰对中国之入侵才渗透进来的。近代志士仁人为救亡图存,急于要将西方政制移植中国,试图尽快使国家繁荣富强,其中的革命派甚

至主张将西方政制中最先进、最彻底的部分搬来，做为救世之良药；改良派虽一直主张渐进，但在辛亥革命前夕随着形势的发展，为取得和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也力图以另一种激进超前的政治方案来代替革命党人的方案。其实，两者的方案在当时都是难以成长的缺肥少土之芽。由爱国而民主，是近代中国民主思想发生和发展的特殊逻辑规律，在这个规律的作用下，一定时期内，各派资产阶级领袖们对民主政治的构思往往超前而脱离实际。由于超前的民主政治构想脱离于现实的国情，仅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说，自然使在辛亥革命期间一度有所沉寂的政治保守主义在民初再度兴起，从而客观上造成了袁世凯政权向专制独裁演化的思想舆论背景。

本章第二节考察了民初政党之畸形和代议制度的脆弱性。辛亥革命后政党的存在及其活动具有了完全合法性，资产阶级各派竞相进行组党活动，使组党热潮在民初社会风靡一时。然而，当时名目繁多的政党，包括几个较有影响的大党在许多方面都还很不成熟，具体表现为：提不出一套比较完整的政党政治理论去指导行动；脱离群众、也往往脱离自己所代表的阶级主体；组织队伍涣散；各党之间的竞争也基本未脱离旧时代“朋党”之争的窠臼。在一般情况下，民主政治是由多政党运作来开展的，而民初各政党的上述不成熟状况，显然使它们不具备这种能力。代议制度，是近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它本质上是资本运动的逻辑结果和本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一定程度发展的产物。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虽已有些规模，但与传统经济和外国在华资本相比还很弱小，特别是由于中国资本家阶级在经济、政治上的若干特点，造成民初代议制度本身以及它的社会基础都是十分脆弱的，主要表现在：它缺少自己阶级主体力量的强固支撑，缺乏社会的普遍认同，自身结

构也存在着种种缺陷。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使深受传统政治观熏染的袁世凯及其政治盟友，愈加强化专制独裁主义的政治取向和运作。

第三节首先介绍了辛亥革命后社会秩序陷于失范和混乱的状况，并分析了产生这种状况的某些人为因素，接着对民初各界有关恢复秩序的渴望及其表现进行了考察。认为由于辛亥革命主要是通过城市起义来实现的，革命后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受到的冲击也主要表现在各地大中城市及其附近地区，因而，民初各界尤其是城市市民和工商业资产阶级普遍不满意受暴力冲击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他们渴望尽快结束这种混乱局面。又由于民主共和政体下的代议制度和各派政党都解决不了这一迫切的现实问题，而人们心目中的“强人”袁世凯，这时还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革命后残留下来的政府机器及其官僚系统，拥有一支效忠于他的北洋军队，加上成熟的政治经验，这一切都成为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有利条件。所以，人们自然而然地将恢复和安定社会秩序的主要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因而也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他所采取的专制集权措施。

第四章是关于民国成立以后袁世凯政权的一般评价。

本章第一节明确认为：在袁世凯当政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其政权结构仍具有资产阶级政体形式及其相关内容。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对袁政权持否定态度的一个重要论据，就是认为“《中华民国约法》（俗称“袁记约法”），把封建军阀独裁制度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所以，本节对这部约法规定的政体原则、总统职权等内容进行了分析比较，认为尽管袁世凯主观上刻意扩大自己的权力，力图造成适应其独裁统治需要的政权组织形式，然而，慑于辛亥革命后新的法统观和各派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合力”作用，使他不可能在

较短的时间内改变资产阶级政体,要改变也只能是局部性的。资产阶级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仍有相当之地位和作用,主要表现为:许多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在政府中担任了各种领导职务;多数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团体在袁当政的大部分时间内还是活跃的;资产阶级法制建设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第二节论述了袁世凯政权的经济政策与民初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首先简要分析了袁世凯需要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因,即面临军政费支出浩繁而财政窘绌的严峻局面和出于争取人心的政治需要,同时也有他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实业的一定思想认同。接着,介绍了各项经济政策和法规的出台情况,并援引有关学者的评价,认为从经济法令的制定和其连续性来看,袁世凯政权时代已形成了一定的法的体系。最后,针对一些论著认为袁统治时期所制定和颁布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法规,只是“聊表姿态”或“权作招牌工具”的观点,本节对这期间主要法规条例的贯彻和实施情况,以大量史料进行了考察和分析。结论是,除发现个别奖励条例因财政困绌未能实施外,其它基本的法规条例都有贯彻和实施的实际行动。另外,这一时期袁世凯政权还没有体现出多少官僚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垄断与利益独占性的特征,主要原因是它困绌的财政无力去进行经济垄断,民国以后新权贵欲积聚庞大的投资性资本也需要有一个时间过程。所以,大资本没有多么迅猛的集聚和发展,而中小企业发展快,是袁世凯统治时期工商业经济发展的特点。总之,袁世凯政权政治上趋向独裁,而在经济上并不排斥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以及他所表现的一些明智的推动作用下,当时的社会经济是呈恢复和发展势头的。

本章最后一节是分析袁世凯统治对中国社会的主要负面作用。本着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既不能去刻意拔高和美化,也不能不

顾历史条件来任意指责和苛求的基本原则，笔者主要围绕袁世凯个人能够负和应该负的直接历史责任来展开分析。首先，综合概括了他个人政治风格的主要特征：重利害、轻是非；重经验、轻学理；重权术、轻道义。认为他作为北洋集团的最高首领，其这种政治风格对集团成员起了恶劣的榜样作用；他据有的一国元首之地位，这种政治风格也无疑对民国以后政坛上种种不健康的运作和表现，负有部分直接的个人责任。接着指出他揭开了民国时期军人干政的帷幕。笔者赞同认为中国近代军阀政治迄始于1916年以后的观点，同时也指出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国家虽然还未完全进入赤裸裸的军阀政治阶段，但由于首先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动辄利用和操纵自己的军队去进行政争，因而为后来的军阀政治示范了一个榜样和模式。最后，分析了袁世凯个人与身后各派系军阀形成之间的关系。书中认为关于军阀不同派系的出现及其混战的原因，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是由于地方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但是，由于这两个因素在近代中国是长期存在的，而不止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才有，所以该论断还未能揭示出产生这一现象的全部原因，有待于人们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和寻找。而仅从当时的具体情况看，袁世凯生前为使自己在北洋系统等级金字塔中稳固地高踞塔顶，一直在北洋诸要员中玩弄平衡术，是导致直皖两势力分别坐大并在他死后发生分裂的直接原因。而随着直皖两派系的分裂和形成，奉系才有条件发展壮大起来。另外，西南诸军阀之得以形成，原因固然很多，但袁世凯所奉行的武力统一政策，导致对方为抵抗而发展壮大实力，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具体原因。由此可见，北洋各派系军阀和其它地方军阀的形成与出现，均是与袁生前施展权术和奉行的政策直接相关的，这其中有些虽然是他始料所未及，也并非是他所希望

的,然而各派系军阀分裂的事实及其混战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深重灾难,袁世凯无疑要负有很大的个人历史责任。

第一章 晚清的袁世凯及其北洋新军

在人们长期以来的印象中，袁世凯早已盖棺定论，似乎是不应当会引起什么争议的人物。这位中华民国共和政体的第一位正式大总统自死去以降，他的名子几乎成为近代中国反动政治的同义语，其北洋军队也基本上被认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忠实工具、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反动力量”。从1912年到1949年的中华民国时期，袁世凯和蒋介石分别是这一头一尾的两位正式大总统，如果说后者还曾得到一些人们的某些积极评价的话，那么前者则是国共双方都痛责的人物。由于袁世凯留下的言论著述远逊于蒋介石，人们对他所谓主观动机的评价不免带有很大的推测成份，其实，人的主观动机——私下真实想法的底蕴是最难把握和探知到的东西；人的行动，受客观条件的制约，也往往不由自主而难以办到自己主观所想之事。所以，研究历史如同侦破案件，甚至可以说从宏观到微观它所把握的东西比后者更有难度。

对于人物活动的研究，人们公认以纵向的阶段性和横向的方面性来考察才是比较全面的。我们从实践活动本身的角度来看，晚清时期的袁世凯在具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后，对先后展现在他面前的晚清政治近代化三个主要阶段：维新运动——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他基本上追随、卷入乃至跟上了时代潮流；在晚清中国抵抗帝国主义各种形式的侵略和发展社会经济这两个主要方面的活动中，从许多事实来看，他在东、西方列强侵略行径面前是有警觉和抵抗的，对他曾主政过的直隶、天津等地经济社会发展也是起了促进作用的。同时，对他创建的北洋新军在清末时期

的性质类属,也需要我们从历史背景、体制形式和政治倾向等方面,以新的角度来深化认识。

第一节 清末袁世凯主要政治活动之考察

袁世凯是清末北洋集团的创始人和最高首领,这个集团在清王朝覆灭前夕的一系列表现,是袁世凯在清末政治倾向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列宁曾经指出,由于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和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一种意见。为了避免这种倾向,我们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即按照清末政治史发展的主要脉落和方面,对其进行总体考察和评价。

袁世凯,字慰庭,别号容庵,咸丰九年(1859年)出生于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他早年原本希冀通过科举常规走入宦途,但连年不第,使其愤言“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①从此另辟蹊径,开始了他长期的军政生涯,并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各种政治风浪的实践磨练中,成为左右清末民初政局的乱世豪杰。

1. 在清末政治近代化运动中的表现

从清末政治近代化发展的纵向看,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稳健力量先后开展过两大政治运动——维新运动和立宪运动。在这两次运动中袁世凯没有做旁观者,而是以他特有的方式参与和卷入其间,特别是在立宪运动中表现更为积极、活跃。

甲午战争失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开展了救亡图存、维新变法的运动。当时,袁世凯“心颇慕之”而参加了这一运动,并成为维新派所成立的强学会“发起之一人也”。^②康有为几

① 沈祖宪等编《庵子弟子记》卷一,第1页

② 沈祖宪等编《容庵弟子记》卷二,第37页。

次上书遭到拒绝，后无人敢代为转递至清廷中枢，是袁世凯在督办军务处任职上代递了康 1895 年 6 月的万言书，以示支持和同情变法的主张。随着维新运动向纵深发展，就是在维新派内部也渐渐分化为激进和稳健两派，严复、张謇等人采取了持重的态度，与康、梁等激进派渐渐拉开了距离，但他们在万般无奈的形势下都视袁的新建陆军为可以依赖的武力后盾。

当时，袁仅三十六、七岁，其官职地位并不高，其新军的实际力量也不大，不足万人。而驻防在京畿、天津一带由满清贵族荣禄掌握的军队达 10 多万人。他在体察了当时形势并与部署于周围的荣禄兵力进行对比后，最终抛开了维新派以求得自身的发展。关于他戊戌告密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有争议的。袁多次否认自己曾向荣禄和慈禧太后告过密。民国二年（1913 年）他在与张国淦谈话时还说：“当时宫廷和天津督署，天天有私人往还，所有秘密，他们知道比我多，比我快，何待我告密？”^①但无论袁告密一事的真伪情况如何，他没有按照激进维新派的请求采取军事行动是事实，而我们也不能根据他当时没有轻举兵戈，便否定了他对维新运动曾有过的参与和支持。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高潮。应当说，革命与立宪同是这一高潮中都有意义的两股巨流，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以武力推翻清王朝，改良派则反对使用革命手段，但他们要求废除封建专制制度，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则与革命派有共同之处。在这种背景下，资产阶级改良派纷纷提出以设立议会和责任内阁制等为内容的政治改革，在 1903 年至 1904 年之交他们还公开呼吁实行君主立宪。^②

① 参见《黑龙江教育学报》1986 第 1 期，陈景华：“也谈戊戌政变的直接原因”。

② 参见中华书局第三次修订本《中国近代史》，第 389 页。